

新中國對舊知識精英的吸納

——以蔣維喬為例

• 林 盼

摘要：本文以民國著名教育家蔣維喬在1949年以後的經歷，討論中共新政權對舊知識精英的政治吸納及後者的回應等問題。既有研究對於政治吸納機制的形成過程以及被吸納者的思想態度關注不多，也缺乏較為具體的實證研究。本研究發現，新政權在建立之初，即形成了一整套成熟的措施，借助人大政協吸納(行政吸納)、社會組織吸納(社團吸納)等多種渠道，有效地將舊知識精英納入到管理體系之中。即使是長期遠離政治的邊緣文化人，也能被加以吸納並有序參與各項社會事務活動；通過思想教育和理論學習，逐漸建立起對新政權的了解與信任；且在政府的支持下，能夠繼續發揮專長，獲得相應的政治待遇。上述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得舊知識精英逐步形成對新政權的認同，進而產生情感意識上的歸屬意識。

關鍵詞：政治吸納 情感歸屬 知識精英 新政權 蔣維喬

一 如何對待舊知識精英？政治吸納的機制與作用

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時，執政黨面臨的一大任務是，如何處理好舊時代留存下來的各類人員，「使工人、農民、小手工業者都擁護我們，使民族資產階級和知識份子中的絕大多數人不反對我們」^①，這關係到政局穩定和經濟社會發展，茲事體大。為了盡快穩定局勢，恢復生產，執政者以來者不拒的姿態，動員原有人員留在原來的崗位。早在1949年初，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發布命令，要求「不要打爛舊機構」，中國人民解放軍和新成立的各地方當局設法留住官僚資本企業中供職的經理、工程師、技術員，保持他們的「原職、原薪、原制度」，這一政策被形象地稱為「包下來」^②。「只要一技之長而不是反動有據或劣迹昭著份子，一概予以維持，不要裁減……凡願繼續服務者，在人民政府接管後，准予量才錄用，不使流離失所」，覆蓋面達到七十五萬人以上^③。

而在應對舊知識精英的問題上，做法則稍有不同。所謂舊知識精英，一般是指從舊時代過來的專家、學者、教授、文藝工作者、醫生、工程師、記者、教員等，是「專靠知識生活的人，那就是說，指一般以求知或傳知為職業者」^④。民國時期，國民政府十分重視吸納知識精英進入政府，這與當時流行的「專家治國」論有關，更主要的是借助知識精英的才學和聲望來加強政府的合法性^⑤。總體而言，由於國民政府對基層社會的控制能力有限，難以採取制度性的手段吸引知識精英，因而以「選擇性吸納」為主，有針對地將部分精英引入政府，多數知識精英仍然留在體制之外。這種相對鬆散的治理狀況，是新生的共產黨政權所不能接受的。

1948年，毛澤東在〈關於目前黨的政策中的幾個重要問題〉一文中指出，「學生、教員、教授、科學工作者、藝術工作者和一般知識份子的絕大多數，是可以參加革命或者保持中立的，堅決的反革命份子只佔極少數。因此，我黨對於學生、教員、教授、科學工作者、藝術工作者和一般知識份子，必須採取慎重態度。必須分別情況，加以團結、教育和任用，只對其中極少數堅決的反革命份子，才經過群眾路線予以適當的處置」^⑥。而在實踐過程中，「改造」取代「任用」，成為知識份子政策的核心部分。所謂「團結、教育和改造」，首先是爭取一切愛國的知識精英為人民服務，使其參與到新中國的建設中來；同時輔以政治教育和思想改造，使舊知識精英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思想，形成新的世界觀，「做一個完全的革命派」^⑦。通過對知識份子的思想觀念進行批判，要求掌握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以期提高知識份子對新政權和執政黨的政治認同。

除了「團結、教育和改造」之外，執政者還建立起政治吸納機制，將舊知識精英制度性地引入政府。對於政治吸納機制的的作用，已有不少學者加以論述。一般認為，中國政治能夠保持長期穩定，一個重要原因是政治體系具有強大的政治吸納能力，「政治吸納是政治系統獲致和維繫政治統治合法性的基本方法，是政治系統中的統治者通過建立特定的制度體系，採取各種方法和手段把特定的社會群體及其成員納入到國家的主流政治生活之中的活動」^⑧。中共中央統戰部的報告中表示：依託黨外知識份子聯誼會等組織吸納人才，有助於形成薪火相傳、人才輩出的良好局面^⑨。

在政治吸納的方式上，主要包括政黨吸納、人大政協吸納（行政吸納）和社會組織吸納（社團吸納）三個方面^⑩，其中政黨吸納一般是指中共的政黨吸納；行政吸納是指政治體系通過人民代表大會（人大）和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政協）的制度性安排而實行的吸納方式；社團吸納是指政治體系通過體制內的社會組織（如中華全國總工會、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中國科學技術協會、中華全國歸國華僑聯合會、中華全國台灣同胞聯誼會、中華全國青年聯合會、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中國作家協會、中央文史研究館等）而實行的吸納方式。在改革開放之前，政黨吸納的主要對象是工農兵，知識份子除了個別時期（如1956年周恩來〈關於知識份子問題的報告〉發表之後，出現了一波知識份子入黨潮^⑪），多數時間都被排除在入黨的行列之外。針對知識份子的政治吸納主要是行政吸納和社團吸納兩種方式，這些吸納方式是在實踐中加以摸索、逐步完善的。

既有對於舊知識精英的研究，多數基於教育和改造而展開，討論1949年之後若干政治運動和思想批判對知識份子的影響^⑫，較少涉及與政治吸納相關的議題。從現有的資料來看，至少從1948年起，中共中央就已開始思考如何構建政治吸納制度，盡可能地將知識份子納入其中，充分發揮其專業能力，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這些制度在具體的推行過程中，不免出現偏差走樣的情況，對一部分知識份子的境遇造成巨大衝擊。但也需要看到，行政吸納和社團吸納兩種方式的綜合使用，在政治運動相對平緩的時期發揮重要作用，使多數知識份子有渠道進入體制，參與制度的設計與建設，進而成為新政權的「同路人」。本文認為，對於政治吸納政策的形成和演變過程加以探討，並通過案例的形式進行呈現，具有一定的學術價值。同樣，對被吸納對象如何看待政治吸納，又如何應對與調適，也需要通過材料給予展現。

本文關注的蔣維喬案例，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彌補既有研究的不足。蔣維喬(1873-1958)，字竹莊，號因是子，是近現代著名教育家、哲學家、佛學家、養生學家，江蘇武進(今常州)人，清末在商務印書館編譯所編輯小學教材，開辦師範講習所；辛亥革命之後短暫出任教育部秘書長，後辭去公職，出洋教育考察；1929年後，先後任光華大學文學院院長兼國文系主任、誠明文學院院長、鴻英圖書館館長、《人文月刊》社社長等職，著有《中國近三百年哲學史》、《中國佛教史》、《因是子靜坐法》等^⑬。自1896年起直至1958年1月底，蔣持續寫了六十餘年的日記^⑭。2021年，筆者與二位同仁聯手，將《蔣維喬日記》全本整理出版(引用只註冊數、頁碼)^⑮。值得注意的是，1949年後，蔣撰述了四十餘萬字的日記，大量記錄了一個從舊時代過來的知識精英如何受到政治吸納，在思想和行動上又如何回應的過程，有助於研究者分析新政權建立秩序、保持政治穩定的方式，了解處於歷史轉型期的知識精英所面對的境遇^⑯。

二 行政吸納：權力滲透與制度建設

1948年，由於解放戰爭的局勢逐步明朗，如何爭取知識份子的支持，構建吸納知識份子參政議政的制度，成為中共高層重點思考的問題。7月，中共中央發布關於新建解放區中知識份子問題的文件，其中提到「高級知識份子可以安心，便於爭取。這些高級知識份子是國家的重要財富之一」，利用講演會、座談會、辯論會等方式進行時事教育和理論上的辯論說服，逐步使其融入新體制^⑰。1949年3月，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開七屆二中全會，毛澤東在講話中指出，「黨的工作重心由鄉村移到了城市。……必須用極大的努力去學會管理城市和建設城市」，在這一過程中要爭取知識份子的支持^⑱。

上海作為全國性的經濟中心城市，必然成為城市管理工作的重點。1949年4月，渡江戰役發動前夕，毛澤東就已在致鄧小平、饒漱石、陳雲的信函中指出，「接收及管理上海，如果沒有自由資產階級的幫助，可能發生很大的困難」，因此要更多地吸引黨外人士參加工作^⑲。5月，周恩來在接見即將南下的潘漢年、許滌新、夏衍等人時指出，「在文化教育等方面，上海是『半壁江山』」，「所以要尊重他們，聽取他們的意見」^⑳。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5月

底，新的上海市政府成立之後，高度重視知識份子工作，加強文化界人士的團結合作，將其作為衡量黨的統一戰線政策能否有效落實的標準。6月初，市長陳毅召開上海市文化界知識份子座談會，闡述黨對待知識份子的政策，初步釋除了知識份子對新政權的思想顧慮^②。

作為舊知識精英的代表人物，蔣維喬成為新政權着力關切和吸納的對象。1949年6月7日，應上海市政府文教管理會的邀請，蔣參加了私立專科以上學校校長、教授、學生代表座談會。座談會先由文教管理會高教處副處長唐守愚致詞，後請各校長談話。大夏大學校長歐元懷提出三點意見：一、學費標準應如何訂定；二、學校訓導處取消後，應由何種機構來指導學生；三、私立大學行政制度應如何規定，用校長制還是用校務委員會制。隨後由各校長及同學發表意見，副市長韋愨、中共中央華東局宣傳部長舒同、上海市宣傳部副部長馮定一一作答。唐守愚發表結論：政府對私立各校「盡量協助，不加干涉」(第七冊，頁3558)^③。這是蔣第一次參加共產黨組織的會議。半個多月後，上海市政府在逸園飯店舉行建黨二十八周年晚餐會，邀請農工商、文化、婦女、宗教各界人士參加，被邀者千餘人，其中也包括蔣維喬(第七冊，頁3562)。

從蔣維喬的日記可知，新政權對舊知識精英的吸納，從一開始就呈現出制度化、組織化的特徵，在行政吸納方面充分表現出來。1949年10月25至31日，蔣受邀參加了在無錫召開的蘇南區第一屆各界人民代表會議第一次會議。此次會議出席代表485名，特邀代表34名^④。各界人民代表會議是人大的過渡形式，是人民政府聯繫群眾和傳達政策的協議機關和諮詢機構，還不是政權機關，只有在它代行了人大職權時才成為過渡性的權力機關^⑤。據《蔣維喬日記》和各方材料所見，第一次代表會議的召開過程如下：(1)根據代表籍貫劃分小組，學習《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的條目內容；(2)舉行全體會議，制定各單位代表團及主席團組織規程，推選主席和常務主席，由蘇南區黨委書記陳丕顯作〈關於蘇南今後工作的方針和今年秋冬兩季工作任務的報告〉，蘇南行政公署主任管文蔚作〈關於政協的基本精神與共同綱領的傳達報告〉，蘇南行政公署副主任劉季平作〈蘇南七、八、九三個月的政府工作報告〉；(3)各小組預備提案，推選發言人，向主席團匯報討論內容，通過決議；(4)會議閉幕之後，召開駐會委員會特別會議，對各項議案進行整理，形成審查結果。會議舉行期間，還穿插了「奏樂、唱國歌、放鞭炮，向毛主席像行三鞠躬禮，為先烈靜默三分鐘」、「獻錦旗」、「獻巨大會徽，二十一位腰鼓手、八位高舉火炬繞場一周」等儀式性活動(第七冊，頁3588)。

參加各界人民代表會議，對於蔣維喬等舊知識精英而言，是一次全新的體驗。蔣記載，獲邀參加會議的同鄉老友眾多，如龐甸材、儲南強、顧嶠若、黃星若、朱夢華、侯葆三等。會議召開過程中，既有正式活動，如研讀《共同綱領》、審查會議議案、討論減租條例等，也有茶話會、酒聚等一些非正式活動。正式活動先分小組進行，與會代表均有發言機會，隨後形成統一的發言底稿，提交會議主席團。非正式活動一般有陳丕顯、管文蔚等重要官員出席，也盡量給予代表發言的機會。蔣幾次發言，「略述感想」。會議結束之後，他還被推選為駐會委員會副主席，因此多留兩日^⑥。他對參加代表會

議的感受是：能夠有渠道表達意見，「非常快樂」，但會期十天，強度較大，「連日疲勞」（第七冊，頁3587、3590）。

1949年12月，蔣維喬又參加了各界人民代表會議第二次會議。此次會議過程較為簡潔緊湊，會期僅三天，首先召開主席團會議，議定議程，其後舉行駐會委員會會議，各代表團匯報第一次會議決議的宣傳落實情況。因蔣年老，陳丕顯、管文蔚允許他「〔11日〕午後會議不必再去」（第七冊，頁3598），故而在駐會委員會會議尚未結束之時即先期離會。此前的11月30日，蘇南區各界人民代表大會召開駐會委員會正副主席會議時，蔣也「因生痘，正在治療」，已向大會請假，「因疾不能行」（第七冊，頁3596）。

第三次會議在1950年9月3至12日召開，過程與之前兩次會議類似，同樣有全體大會、駐會委員會會議等程序，也有陳丕顯、管文蔚等領導介紹議事規則、報告政府工作等內容，會議主旨是討論土地改革和《農業稅暫行條例》施行問題。蔣時已年近八旬，連日開會，倍感疲乏，「腹中不快，屢欲大便」，幾次缺席小組會議，即使參會，也要求「退席休息」。會議結束之後，按照慣例召開駐會委員會會議，決定新一屆的委員名單，蔣以「年老，又須赴〔香港〕九龍，不得常常出席」為由，主動提出免選（第七冊，頁3660-61）。

1950年2至8月、11月至次年7月，蔣維喬先後兩次前往香港訪友遊玩；1951年7月回滬，處理誠明文學院和愛國學校之事務（第七冊，頁3730-35）；12月底前往無錫，參加蘇南區第二屆各界人民代表會議協商委員會，就開展增產節約運動，反對貪污、反對浪費等議題展開討論^⑥。此後直至1955年，蔣作為政界的「邊緣人」，一直沒有參與過政府的日常活動。1955年3月，上海市政協進入籌備階段，政協秘書處主動派人前往蔣宅，希望蔣進入政協，蔣表示「政府好意我不能不接受，但我年老，怕出門，又怕乘電車，開會時未必能準時到」，政協允諾「重要會議當派車來接，平常會議不到亦可」（第八冊，頁4023）。5月12至15日，上海市政協一屆一次全體會議召開，出席委員250人，列席251人，蔣作為正式委員出席活動。政協會議的議程與蘇南區各界人民代表會議類似，同樣先召開小組討論會，然後舉行大會，通過大會主席團、正副秘書長和提案審查委員會名單，聽取市各界人民代表會議協商委員會副主席胡厥文所作的工作報告，以及時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二書記陳丕顯所作的政治報告，各小組就報告內容進行討論。政協會議的會期相對較短，前後四天時間，通過〈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上海市委員會組織簡則〉，選舉市政協第一屆委員會主席、副主席、秘書長和常委共八十人，組成第一屆常委會^⑦。一個月後，政協召開常務會議，討論鎮壓反革命、特赦政治犯、統購統銷等議題，蔣記述，「連日四天開會，余甚疲乏，晚間不能寐，服西神藥水方入睡」（第八冊，頁4044-45）。9月3日，政協再次召開常務會議，制訂下半年工作計劃，由上海市委第一書記柯慶施主持，統戰部長劉述周、公安局長許建國等相繼報告。會議即將結束之際，蔣因年老體衰，無法持續一日端坐會場，「竟發頭暈，幾於不能支持」，不得不提早離席（第八冊，頁4062）。此後召開的政協會議，蔣均只參加部分活動，或者選擇性地參加重要會議。

政協委員的主要工作是審議政府交議的文件和法案，協助政府動員人民參加各種運動，發起並推動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民主人士進行時事教育和政

策學習等²⁹。據統計，從1955年5月到1957年底，蔣維喬共參加政協會議及由政協組織的各項活動七十餘次，通過這一平台提交議案，發表個人意見。主要討論的議題包括：上海市第二屆人大的代表推選方案、孫中山先生九十誕辰紀念活動的安排、漢語拼音草案、整風鳴放問題、解決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等（第八冊，頁4036、4170、4109、4223、4214）。同時，作為政協委員，蔣還多次參加市政府時事工作通氣會。如1956年1月10日，副市長宋日昌報告徵兵經過；2月8日副市長金仲華講解最近時事；7月14日，金仲華報告近期前往赫爾辛基參加國際新聞記者會的見聞；12月14和18日，柯慶施報告國內外時事；1957年2月6日，中國民主建國會上海市委常委郭棣活介紹此前訪問蘇聯、捷克斯洛伐克、羅馬尼亞、保加利亞的情況；8月14日，由金仲華主持、劉述周報告近期反右派鬥爭的有關情況（第八冊，頁4093、4100、4139、4182-83、4196、4233）。對於上述活動，蔣雖然積極參與，但對於座談會、通氣會動輒舉行三四個小時的狀況並不滿意，在日記中多次記錄「中間未曾休息，極為吃力」，並以頭暈為由幾次提前離開。他對於官員報告時的表達方式也有看法，如評價柯慶施的講話「言繁詞複」，理解不易（第八冊，頁4182-83）²⁹。

綜上所述，利用行政吸納的方式，發揮舊知識精英的社會影響力，使之與政治體系緊密融合的做法，在新政權建立之初便已進行探索與實踐，行之有效。被吸納的舊知識精英積極履行參政議政的義務，利用渠道表達觀點看法，培養對執政黨、政治體制和意識形態的認同，表現出權力逐步滲透的特徵。

三 社團吸納：組織舊知識精英參與建設

除了行政吸納之外，將鬆散的體制外成員吸納到社會組織之中，也是新政權常用的政治吸納方式。從蔣維喬的經驗來看，社團吸納主要的做法是，先將影響力較大、地位較高的精英加以吸納，再通過精英的關係網絡，將其他人員引入組織，構成「滾雪球」效應。精英加入組織之後，還有機會獲得高層支持，掌握社會資源，充分發揮個人才幹，參與到國家建設之中，形成組織與個人的「雙贏」局面。

1953年3月，上海擬組建文史研究館（以下簡稱「文史館」），以團結與安置文化名家、社會賢達。蔣維喬獲邀參加文史館籌建的座談會。陳毅全程出席，並發表講話，表示「解放以來，尚未有暇向上海耆老請教，此次特邀集座談會，請諸老多多指教」。陳毅還在統戰部副部長周而復、文化局長夏衍的陪同下，與蔣及趙樸初、顧頡剛等深入交流，「談話特多」。隨後幾日，周而復邀請蔣等幾位老先生聚餐，「談及上海市文史館急待成立，須請幾位老者組織委員，將提名之人加以審查，然後請市政府委員會通過」（第八冊，頁3846-48）。

6月8日，文史館成立，召開第一次委員會，張元濟任館長，首批十一名委員中，包括蔣維喬及周子同、沈尹默、豐子愷、顏福慶等。文史館創立後，蔣定期參加相關活動。常規活動包括每月召開一次的館員茶話會，主要議程是討論文史館的工作、館員的評選標準、館員薪水等級評定等（第八冊，

頁3960)。重要活動如1954年4、5月每周召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討論會，自序言、總綱至具體章節，形成意見之後提交有關部門(第八冊，頁3942-52)。在憲法草案通過之後，文史館委員或館員住宅相近者分為討論小組。蔣作為召集人，領導宋小坡、陳修崇、尹石公、周南陔、朱曼僧、黃藹農等七人定期研討，以漫談的形式發表意見(第八冊，頁3963-64)。

文史館成立之初，規定入館有三個條件，即「文可崇」、「老可敬」、「窮無靠」，也就是「年齡在六十歲以上，歷史清楚，在文化上有一定修養，並有一定人望〔社會聲望〕，而家境清寒，生活困難」(即蔣維喬在日記中所稱的「年老貧苦文人」〔第八冊，頁3821〕)⑳。這些標準還是較為寬泛，所以老館員的推薦權就顯得尤為重要。作為文史館的耆老，蔣多次就申請者的入館問題發表意見。如化學家薛德炯每日奔走生活，難以完成《化學辭典》一書的編撰工作，蔣提出「可否設法介紹入文史研究館，補助其一部分生活，俾得專心編著」，並表示推薦入館並非因其貧困，而是出於「幫助科學工作者」的目的㉑。另外，蔣還在范之杰、許昭、李華英、葉叔眉、沙善餘、宋國賓、吳夢飛、王幼宸等人進入文史館的問題上發表書面意見，認為上述人等「合於入館條件，擬定的薪資亦無意見」，並提到教育家陳客「在文教界有名，人品學問俱極優良」、攝影家錢景華「是奇才」，建議文史館爭取二人入館㉒。

由於蔣維喬所掌握的推薦權，不少友人企望借助蔣之關係進入文史館。尤其是在館員名單尚未確定之時，數月之間出入蔣宅求其說項者不計其數，如呂慧依、王惠民、袁孝谷、凌昌炎、姚紹枝、吳和士、錢化佛等。曾在上海商科大學教書的哥倫比亞大學碩士蔡正雅，為能進入文史館，先後委託蔣維喬、顏福慶、周予同三人提名，並託黃炎培聯名推薦。為防止多人參與反而誤事，蔣致函黃炎培，請其「專函致上海市長〔陳毅〕，或就近在京與陳市長接洽」(第八冊，頁4025)。更有友人為謀館職扶病而來，如以畫菊花聞名的畫家繆谷瑛，以重病之身來見蔣，「年七十九，步履艱難」，需有人扶之方能上下樓梯。繆谷瑛述及舊日情誼，望蔣作為提名人推薦入館，結果文史館尚未成立，他已謝世(第八冊，頁3849、3859)㉓。

作為文史館委員與政協委員，蔣維喬享有較高的政治地位和特殊待遇，例如：有資格閱覽政府文件和《參考消息》，如1957年4月12日，「閱毛主席在〔3月12日〕中共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講話，並《參考消息》」；參加政府組織的重要活動，如參與傳達中央最新精神的會議；參加勞動節勝利遊行；參觀蘇東國家社會主義建設成就展；列席周恩來總理在滬講話(第八冊，頁4210、4085、4214、4213)，還有出門車接車送、獲得華東醫院就診證及副食品購買證等福利待遇。而市政府接待文史、宗教領域的客人，也會邀蔣作陪，如1954年7月22日，市政府邀請河南文史館一行，蔣與上海文史館館員江翊雲、徐森玉、尹石公等獲邀參加；1955年10月10日，緬甸到北京迎接佛牙的佛教代表團到滬，時任上海市副市長劉季平設宴款待，邀請蔣維喬、趙樸初等人作陪；1956年9月13日，市政府和中國佛教會舉行宴會，歡迎國際佛教僧侶代表團，蔣受邀出席(第八冊，頁3965、4073、4159-60)。1955年5月，蔣還被任命為新成立的上海市報刊圖書館館長，馬蔭良、嚴獨鶴任副館長㉔。

同時，蔣維喬也依託文史館和政協兩個平台，積極與政府接洽，發揮自身專長，為建設國家出力。他的作用主要體現在氣功教導與宣傳方面。蔣從小體弱多病，常年有頭暈、心跳、耳鳴、目眩、盜汗等病症，甚至在二十八歲患上嚴重的肺結核，經自學呼吸靜坐法而痊癒，因此潛心研究這門氣功。1914年，他根據個人經驗撰寫《因是子靜坐法》，首創以現代科學解釋傳統功法的先例，風靡全國，對養生文化的推廣起到了很大的推動作用^⑤。據其日記，新政權建立之後，向其諮詢靜坐法原理方法的有數百人，其中不乏陳毅、華東行政委員會委員兼人民監察委員會主任劉曉、上海市副市長方毅、衛生局長曹國珍等本地中高級官員，以及國務院副秘書長常黎夫、北京市委常委楊述等外地官員。從朝鮮前線回國休養的軍事將領，也由華東軍政委員會秘書長陳同生介紹，就靜坐法的相關問題向蔣請教（第八冊，頁3860、4135、4221、4206、3870）。

因諮詢靜坐法者甚多，蔣維喬遂有意辦一機構，專門介紹、傳授靜坐法的原理和姿勢。他先向上海市衛生局申請，獲批之後，在上海第五中醫門診所下添設氣功科。蔣親力親為，制定專門的氣功病歷表格和講義，並多次前往診所查看設施。為讓蔣免於來回奔波，衛生局囑房屋管理處在靜安別墅撥兩層住房給他居住，但因考慮到靜安別墅的空氣不佳，故而作罷（第八冊，頁4109）。1956年3月26日氣功科開診後，蔣定期駐所指導，每日均有中高級黨政軍幹部數人前來問診；26日日記詳述了蔣駐所時的指導流程：登記病歷表格後，蔣講解靜坐法的原理及方法，並為之示範，助手協助矯正姿勢，前後花去約兩個小時（第八冊，頁4111-12）。「蔣氏氣功門診」聲名鵲起，《解放日報》、《新民晚報》記者皆來採訪，中華教育影片公司還計劃將氣功療法拍成影片（第八冊，頁4113、4131），上海、無錫等地療養院邀請蔣傳授經驗、教授功法（第八冊，頁4106、4121、4125、4129、4132）。

氣功科開辦不足一月，曹國珍即來探訪，就開辦獨立的氣功療養院徵求意見。蔣維喬提出，氣功科雖有成效，總不如辦療養院完善，若能覓到房屋，有二十張以上的牀位，療養院就可辦起來；可去唐山等地調查療養院，獲取辦院的知識，再結合上海的具體情況，加以實行（第八冊，頁4117、4127）。6月29日，曹國珍等人來到門診所，表示政府「極重視氣功」，要求官員「極力支持」，對蔣「非常推重，當面表示政府願供給旅費」，請他前往北戴河氣功療養院考察，為在上海西部設立氣功療養院積累經驗（第八冊，頁4135）。7月底至8月底，八十三歲的蔣維喬前往北戴河療養院調研，並傳授靜坐法原理姿勢，解答學員疑問，糾正練習方法。此次北戴河之行得到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視和全力支持，河北省衛生廳官員全程陪同，療養院領導每日出席接待活動（第八冊，頁4142-54）。

1957年1月底，蔣維喬向衛生局建議，取消門診所氣功科，設立正式的氣功療養院，聘請專業氣功師和助手（第八冊，頁4194）。衛生局採納意見，尋覓數月，在龍華找到了一棟帶有小花園的三層小樓。7月，上海氣功療養院（所）成立，直屬市衛生局領導，設有病房和門診。蔣任顧問，時常赴所向療養員講解功法，並與所長陳濤討論所務（第八冊，頁4229）。在傳授靜坐法原

理方法、推動氣功療養機構建立的過程中，蔣還不顧年老多病，整理出版《因是子靜坐衛生實驗談》，在1956年第10期《中醫雜誌》上發表〈談談「氣功治療法」〉一文，將靜坐法的心得體會廣為宣傳。文章發表之後，諮詢靜坐法的信件自全國各地寄來，「積壓數百封」之多，蔣有不勝應付之感，「裁答費時，頗覺其煩」，但為推行靜坐法服務人民健康的目的，「亦應盡之責」，故而「不能自己」（第八冊，頁3972-81、4176-77、4183）。蔣講授的氣功療法心法頗受歡迎。著名出版人沈昌文時隔半個世紀，依然清晰地回憶起在蔣的氣功門診學會「意守丹田」之法，「破除我執」，成功調理身心的經歷^⑥。

四 適應新形勢：舊知識精英的政治學習與思想建設

從政治立場來看，和願意留在大陸的知識精英類似，蔣維喬對國民黨的執政表現並不認可，在日記中表露不滿^⑦。1932年上海爆發「一二八」事變，蔣記載，「〔日軍〕前來作戰之海陸空軍不下十二萬人，挾其重炮、坦克車、鐵甲車、飛機、炸彈，凡科學所發明之精良利器，應有盡有，而我軍則器械不良，飛機極少，並無大炮，而政府既不發餉，又不派援兵」，「政府之居心如此，人民由失望而絕望矣」（第四冊，頁2092、2094）。1949年上海解放之後，國民黨軍隊多次空襲上海。尤其是蔣所居的閘北地區，幾次受到飛機轟炸，傷亡數百人^⑧。蔣憤而表示，「飛機在頭上旋轉，亂放機槍，國民黨此種無聊舉動，徒傷老百姓，真不知用意何在也」（第七冊，頁3563）。

相較之下，解放軍進城之時所表現出的軍容風紀，給蔣維喬留下了良好印象。1949年5月25日，蔣記載，「人民解放軍於晨二時從滬西開進市區，秩序甚佳，居民早晨睡醒，上海已換一環境，全部解放矣。國民黨軍全部撤退，市政府及警察機關已由解放軍次第接收，人民安堵，惟路少行人，各商店皆閉門，公共汽車及電車停駛，景象如新年耳」（第八冊，頁3554）。30日，蔣參加光華大學校務會議，議決復課事宜，並展開評論：「國民軍在各校正在上課時勒令解散，解放軍一到，即令各校復課，即以此一端相較，一暴一仁已有天淵之別矣。」（第八冊，頁3556）

儘管在心理上更加認同共產黨，但蔣維喬長期以來都算是政界的「邊緣人」，除了民國建立之時短暫從政，擔任臨時政府教育部秘書長，以及1916年後出任過一段時間的江蘇省教育廳長之外，基本保持躲避政治的態度。他視政界為「惡濁」之地（第二冊，頁610），表示「向來不與聞政治」（第五冊，頁2236）。但是，隨着新政權對知識精英吸納程度的加深，蔣不可避免地被捲入到各類政治活動之中；同時，舊知識精英被吸納之後，還被要求參加各種學習培訓活動，以此培養對黨和政治體制的認同，逐漸規範思想行為。

作為政協委員和文史館委員，蔣維喬多次受邀參加專業知識學習座談會（表1）。根據政協委員學習座談會的相關文件，舉辦學習班的目的，在於「通過自由思考，相互幫助，力求領會馬列主義理論和毛澤東思想的真意，同時着重聯繫中國的歷史實際與政治實際」^⑨。

表1 1956至1957年蔣維喬參與座談會列表

日期	主講	座談會內容	《蔣維喬日記》
1956年3月31日	舒新城	「報告視察上海派遣江西墾荒工作者近況」	第八冊，頁4113
1956年6月16日	周抗	主講馬克思主義的誕生過程	第八冊，頁4131
1956年6月28日、7月5日	馮契	主講「意識對物質、思維對存在的關係問題」	第八冊，頁4134、4136
1956年9月13日	王正萍	主講「辯證唯物主義的認識論」問題	第八冊，頁4159
1956年10月4日	沈志遠	主講「唯物辯證法論事物的普遍聯繫與運動和發展」	第八冊，頁4165
1956年11月8日	周抗	主講「唯物辯證法之基本規律『矛盾與統一』、『量變與質變』」	第八冊，頁4174
1956年12月15日	李佐長	主講「唯物史哲學」	第八冊，頁4182
1957年1月17日	胡曲園	主講「社會基礎與上層建築」問題	第八冊，頁4192
1957年2月14日	周原冰	主講「階級與階級鬥爭」	第八冊，頁4198
1957年2月28日	方行	主講「國家與革命」	第八冊，頁4201
1957年3月14日	王正萍	主講「人民和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	第八冊，頁4204
1957年6月13日	李培南	主講「中國革命史導言」	第八冊，頁4223

資料來源：筆者據《蔣維喬日記》整理。

除了參與上述學習培訓，蔣維喬還開始閱讀馬列主義和共產黨歷史的出版物。據其日記，1949年之後，蔣斷斷續續地讀完相關出版物五十餘種（表2）。

表2 1949年後蔣維喬閱讀馬列主義和共產黨歷史出版物列表（節錄）

作者、譯者	出版物	《蔣維喬日記》
一、毛澤東著作（十一種）		
毛澤東	〈論人民民主專政〉	第七冊，頁3578
毛澤東	〈新民主主義論〉	第七冊，頁3561；第八冊，頁3820
毛澤東	〈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第七冊，頁3639
毛澤東	《毛澤東選集》第一至三卷	第八冊，頁3759-61、3791-95、3868-72
毛澤東	〈矛盾論〉	第八冊，頁3783、3875
毛澤東	〈實踐論〉	第八冊，頁3796
毛澤東	〈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	第八冊，頁3820-21
毛澤東	〈《共產黨人》發刊詞〉	第八冊，頁3821
斯諾 (Edgar P. Snow) 筆錄，畢正譯	《毛澤東自傳》	第八冊，頁3921

二、列寧和斯大林著作（七種）		
斯大林	《列寧主義問題》	第七冊，頁 3568
斯大林	《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	第七冊，頁 3570-71； 第八冊，頁 3835-36、 3873-74
斯大林	〈論列寧主義基礎〉	第七冊，頁 3572-74
斯大林	〈論馬克思主義在語言學中的問題〉	第八冊，頁 3829-30
列寧	〈馬克思主義底三個來源與三個組成部分〉	第八冊，頁 3873、 3890-91
列寧	《論馬克思恩格斯及馬克思主義》	第八冊，頁 3875-79、 3890
斯大林	《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	第八冊，頁 3893-96
三、其他共產黨領導人著作（三種）		
聯共（布）中央黨史委員會編著	《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	第七冊，頁 3575-76、 3890
編譯者不詳	《國際主義與民族主義》	第七冊，頁 3613-15
張仲實、曹葆華編譯	《列寧斯大林論國家》	第八冊，頁 3874-75、 3890
四、中共馬克思主義理論家著作（八種）		
郭文陶	《人民本位的世界觀》	第七冊，頁 3535
薛暮橋	《政治經濟學》	第七冊，頁 3593-99
周達人	《新哲學手冊》	第七冊，頁 3626-28
艾思奇	《思想方法論》	第七冊，頁 3637-39
丁大年	《共產主義講話》	第八冊，頁 3804
胡喬木	《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	第八冊，頁 3874
范文瀾	《中國近代史》	第八冊，頁 3981-86
艾思奇	《大眾哲學》	第八冊，頁 3994
五、漢譯俄國哲學家著作（七種）		
郭列夫（Boris I. Goreff）著，瞿秋白譯	《新哲學之唯物論》	第七冊，頁 3564-67
蒲列哈諾夫（Georgi V. Plehanov，又譯普列漢諾夫）著，列夫譯	《馬克思主義基本問題》	第七冊，頁 3582-86
波齊涅夫（外文姓名不詳）著，胡明譯	《辯證唯物論講話》	第七冊，頁 3621-25
米丁（Mark B. Mitin）著，沈志遠譯	《歷史唯物論》	第八冊，頁 3830-34、 3837-45
米丁著，沈志遠譯	《辯證法唯物論》	第八冊，頁 3845-62
凱德洛夫（Bonifaty M. Kedrov）著，袁文德譯	《辯證唯物主義論物質構造方面的現代發現》	第八冊，頁 4129
吉謝遼夫（C. C. Kiselev）著，劉群譯	〈馬克思主義關於基礎與上層建築的理論〉	第八冊，頁 4187、4192

資料來源：筆者據《蔣維喬日記》整理。

其中，《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矛盾論〉、〈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歷史唯物論》、《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馬克思主義底三個來源與三個組成部分〉、《論馬克思恩格斯及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關於基礎與上層建築的理論〉等，蔣維喬均閱讀兩次或以上。對於上述文獻，蔣花費大量時間閱讀，甚至在香港遊玩期間也隨身攜帶，洗浴後都會捧讀，如日記記述，「十時洗浴，浴後閱《聯共(布)黨史》」(第七冊，頁3619)。

閱讀之餘，蔣維喬對部分書籍印象深刻，進行簡評，體現出他的觀點和態度。他認為《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精簡扼要，令人了解」(第八冊，頁3874)，《新哲學之唯物論》「明白曉暢，引人入勝，佳作也」(第七冊，頁3567)，《歷史唯物論》「譯筆流暢，引人入勝」(第八冊，頁3868)，《辯證法唯物論》「甚為詳備，譯筆亦明白」(第八冊，頁3862)。蔣對斯大林的著作〈論馬克思主義在語言學中的問題〉也有評價：「此書說語言學為全人民交際的工具，不論在沙皇時代、社會主義時代，語言為全民服務，其本質絕無變更，只有舊詞及詞彙代謝新詞，新詞彙充實起來，理論明確，譯筆暢達。」(第八冊，頁3830)他也很欣賞幾位本土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的著作，認為艾思奇《思想方法論》「余所閱新哲學書中，無有如此作之佳者」(第七冊，頁3639)，薛暮橋《政治經濟學》「甚為明了」(第七冊，頁3599)，范文瀾《中國近代史》「頗有新的眼光」(第八冊，頁3986)，丁大年《共產主義講話》「明白曉暢，讀之於共產主義極易了解」(第八冊，頁3804)。當然，他也對一些書籍的內容質量表達不滿，如《辯證唯物論講話》「譯筆欠條〔流〕暢，讀之令人不快」(第七冊，頁3625)，周達人的《新哲學手冊》「無甚精義」(第七冊，頁3636)。蔣這樣的閱讀體驗並非孤例，如詞人夏承燾就在1949年3、4月間借讀高爾基(Maxim Gorky)、艾思奇等人的書，「頗有悟入處」，甚至還想「仿此通俗筆墨」^④；哲學家金毓黻也提到艾思奇的著述，認為像《大眾哲學》這樣的論著「條理極佳，舉證易解，以淺近之比譬解艱深之理論，習哲學者必先讀此書，乃能引人入勝」^⑤。可見，對於新時代的來臨，通過大量閱讀進行思想觀念上的準備，是不少舊知識精英的共同做法。

蔣維喬還從報紙上學習中央發布的各類文件及領導講話。如1955年7月，各報刊登國務院副總理李富春在全國人大所作〈關於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報告〉，蔣自言該報告「佔去報紙五版，閱之甚費力，竟耗去全天功夫」(第八冊，頁4049)。又如1956年9月，中共八大在北京召開，各項報告全文刊載於報端，篇幅「極長，看完不易，只有擇要觀之」，為讀完報告，蔣甚至去浴池「亦攜報去看，然終看不完」(第八冊，頁4161)。而為了弄懂赫魯曉夫(Nikita S. Khrushchev)在蘇共二十大上所作的中央委員會的總結報告，蔣也費去半天功夫，直言「極長報告，竟費半天功夫，看得頭暈」(第八冊，頁4104)。蔣閱讀和寫作的過程，印證了一些學者的觀察，即新中國成立之後逐漸形成一種特殊的政治文化氛圍，社會成員需要以符合社會制度所要求的方式來行動，例如順應政治形勢而努力學習並使用意識形態的新辭藻^⑥。

另一項有助於蔣維喬了解新政權的渠道是看電影。民國時期，蔣的日記中僅有二十餘次觀影記錄，自稱「余於電影並不感興趣」，只是顧及親友的興

致而已(第七冊,頁3684)。而從1951年底至1957年4月,蔣共看了四十多部電影。其中有十部屬於政協或文史館組織的活動,但更多的是自行購票,攜家人前往影院。1950年5月,上海電影管理部門制定〈關於加強電影教育的六項規定〉,按照「對進步影片加強推廣,對消極影片加強限制」的原則,抑制英美電影的上映比例,以保證國營電影、蘇聯電影的放映時長⁴³。以此規定為指引,全市影院開展國產片和蘇聯片的觀影活動⁴⁴。

從蔣維喬的觀影記錄來看,多為建國初期所攝反映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及抗美援朝的電影,如《和平鴿》、《內蒙人民的勝利》、《草原上的人們》、《一定要解放台灣》(第七冊,頁3761;第八冊,頁3772、3935、4043)等;也有體現舊社會風貌的影片,如《三毛流浪記》、《江湖兒女》(第八冊,頁3782、3828)、《白毛女》(蔣在日記中點評「此片情節甚佳,採中國北方民歌,尤為入耳」〔第八冊,頁3806〕)等。還有其他社會主義國家拍攝的反映工農業生產新風貌的故事片和各國共產黨對抗敵人的戰爭片,如蘇聯攝製的《拖拉機手》、《攻克柏林》(第八冊,頁3790、3848)、《在和平的日子裏》(蔣在日記中點評「此片是蘇俄八號潛水艇被敵人水雷轟炸,沉入深海,戰鬥員鎮靜趕修,卒能重浮出海面。片係五彩,在海中所攝,極其可觀」〔第八冊,頁3815〕),朝鮮的《游擊隊的姑娘》,阿爾巴尼亞《偉大的戰士》(第八冊,頁4058、4062)等。另外,多部電影未有名稱,僅知其主題為「抗美援朝影片」、「蘇聯彩色科技影片」、「俄國五彩影片」(第八冊,頁3766、3965、3867)等。電影在豐富蔣晚年生活的同時,也打開了一扇了解新政權革命和建設成就的窗口,對其思想情感產生了深刻影響⁴⁵。在蔣的日記中,最後一部記錄的電影是《上甘嶺》,通過電影的細緻描繪,「知道我們志願軍在朝鮮打退美國鬼子之驚人戰績」(第八冊,頁4209)。

學習培訓活動的目的,在於使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等理論逐漸內化到舊知識精英的心理,讓他們得以了解黨和國家的大政方針,通過與其原有觀念的碰撞,逐步改變思想意識。徐鑄成曾回憶1950年代初期的思想改造過程:「各階層人士,都熱烈擁護黨的領導,而決心於自我改造主觀世界」,「我當時心情也無比開朗」⁴⁶。蔣維喬的情況也大體如是。通過參與人大政協事務、深入學習理論知識,蔣在思想層面日漸向組織靠攏。如1950年9月14日,蔣提出希望辭去擔任近十年的鴻英圖書館館長一職,原因是「我以為在人民政府中應切實做事,不應掛名,必須辭去方可」(第七冊,頁3662)。後在相關部門領導的反覆勸說下,方才作罷⁴⁷。又如1952年後,蔣多次指示,將一手創立的毗陵文獻徵存社所藏數萬冊書籍(包括地方文獻、佛教經典等)、甲骨文約千片,以及亡友丁福保收集的數千枚古錢幣貢獻國家,送交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員會(第八冊,頁3778)。而在公開發言中,蔣也時時保持與主流意識形態的同步。如1956年初,蔣在談到今後佛教的發展方向時,提出工作的重點應是「造就各宗人才」,尤其是發掘「真正有志修行、擔當傳承佛教之任」的佛教徒,幫助僧眾「研求佛理、實地修行、期於解行相應」,至於「肅清佛教中反革命份子應繼續進行,而不守清規之敗類亦應排除」(第八冊,頁4092)。

五 結語

縱觀蔣維喬的思想發展歷程，他雖然是一位虔誠的佛教徒，常有閉關參禪之舉，對於政治勢力也刻意保持距離，但是新政權營造的制度環境對蔣產生了顯著影響，表現在日記中記錄他晚年唸咒誦經、研修佛法的次數大幅減少，而參與座談會和報告會、閱讀書籍文件、觀看電影等活動，構成了他生命最後幾年的主要內容。通過分析蔣的事例可以看到，新政權從建立之初，便已形成一整套成熟的措施，借助多種渠道對舊知識精英進行吸納。無論是行政吸納還是社團吸納，都能夠有效地將舊知識精英納入到管理體系之中。只要「有一技之長」，且「沒有反動行為或嚴重劣迹」，都有可能被「包下來」⁴⁸，吸納進體制，進而成為「同路人」；即使是長期遠離政治的「邊緣人」，也會因為政治吸納而獲得「政治激勵」，呈現出「被選中」的感覺，其行為和思想受到形塑，展現出與之前明顯不同的特徵。總而言之，執政者通過政治吸納，將原先未有參與體制內權力與利益分配的社會成員吸納進體制之中，轉換成為扶持和合作的夥伴，擴大執政基礎。政治吸納具有制度化、長期性、選擇性、可控性的特徵⁴⁹。

此外，從蔣維喬的情況也可以看到，政治吸納是一種自上而下的體現國家意志的行為，表現在國家具有很強的自主性，能夠通過政治運動對社會成員造成衝擊，一些精英因此受到過不同程度的影響。事實上，在最後兩年的《蔣維喬日記》中，可以感受到愈來愈緊張的政治氛圍。日記中多次出現「右派份子」、「整風鳴放」等內容，每次集會討論相關問題時，也要求每一位與會者發表意見。或許日益激烈的政治運動，給予蔣巨大的壓力。這一點體現在蔣的結局上。有人稱蔣是抑鬱成疾，因病辭世⁵⁰。而在原因方面，或稱其子受到不公正對待，或稱其孫遭受政治衝擊。觀其日記，1958年1月29日是蔣寫的最後一則日記，所記內容是「突聞家人說〔蔣〕九成昨夕竊我的安眠藥一瓶，服後希圖自殺，已由救護車送勞動醫院救治，我因患病不能出門，家人陸續傳來消息。至晚，雖見好轉，尚未脫危險。不知此次在學校整風中受如何打擊，弄得全家不安」（第八冊，頁4265）。蔣九成是蔣維喬最疼愛的孫子，當時在建浦中學裏工作。蔣維喬在同年3月辭世的原因，很可能與其孫在反右運動中受到打擊有關。

當家人捲入運動之中，對蔣維喬的心理衝擊，最終可能是導致其生命結束的一大因素。由此可見，「團結、教育和改造」三種針對舊知識精英的策略，隨時有可能出現調整和轉換，先前被團結的對象，也會在政治大環境因素的推動下，成為被教育甚至被改造的目標。誰應該被團結，誰應該被教育與改造，都不是舊知識精英本人能夠改變，而是由國家的政治權力所決定的。

與蔣維喬的情況類似，不少舊知識精英在被政治吸納之後，得以參與各項事務活動；通過思想教育和理論學習，逐漸建立起對新政權的了解與信任；且在政府的支持下，能夠有條件繼續發揮專長，得到相應的政治待遇，形成正向的激勵效應，使得舊知識精英逐步形成對新政權的認同，進而產生情感意識上的歸屬感。尤其是在社會變遷的過程中，通過認可身份、提升地

位、改善待遇等方式，將精英吸納到體制之中，能夠有效避免精英與國家政權之間出現裂痕，對於保障政治穩定、創造政治認同、促進有序的政治參與至關重要^⑤。在全新的治理環境下，新政權的制度建設以及包含在其中的資源與規則，是知識份子表現自己行動的環境條件，「而他們在這些制度與話語的約束下的行動和思想……又反過來構成了創造或完善這些制度與話語的實踐」^⑥。總而言之，制度化的政治吸納機制，在新政權建立之後便已形成，並在實踐中逐步發展完善。這是新政權能夠迅速穩定局面的重要原因。

註釋

- ① 毛澤東：〈不要四面出擊〉（1950年6月6日），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一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7），頁400。
- ② 范守信：〈建國初期對官僚資本的沒收和改造〉，《黨史研究》，1984年第5期，頁49；曹佐燕：〈「勝利負擔」：中共對舊政權公務人員處置政策的演變（1945-1952）〉，《史林》，2017年第2期，頁168。
- ③ 《當代中國》叢書編輯部編：《當代中國的勞動力管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頁163。
- ④ 蔣廷黼：〈知識階級與政治〉（1933年5月21日），載謝詠編：《獨立評論文選》（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2），頁144。
- ⑤ 吳錦旗：〈南京國民政府對知識精英的政治吸納機制研究〉，《學術探索》，2019年第1期，頁123-30。
- ⑥ 毛澤東：〈關於目前黨的政策中的幾個重要問題〉（1948年1月18日），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選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頁1269-70。
- ⑦ 毛澤東：〈做一個完全的革命派〉（1950年6月23日），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一冊，頁414-18。
- ⑧ 袁明旭：〈從精英吸納到公民政治參與——雲南邊疆治理中政治吸納模式的轉型〉，《思想戰線》，2014年第3期，頁31。關於政治吸納機制的成效，參見郎友興：〈政治吸納與先富群體的政治參與——基於浙江省的調查與思考〉，《浙江社會科學》，2009年第7期，頁108-15；景躍進：〈轉型、吸納和滲透——挑戰環境下執政黨組織技術的嬗變及其問題〉，載王名主編：《中國非營利評論》，第七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頁30-54；袁明旭：〈從精英吸納到公民政治參與〉，頁31-34；肖存良：〈政治吸納·政治參與·政治穩定——對中國政治穩定的一種解釋〉，《江蘇社會科學》，2014年第4期，頁72-79；孫明、呂鵬：〈政治吸納與民營企業家階層的改革信心：基於中介效應和工具變量的實證研究〉，《經濟社會體制比較》，2019年第4期，頁92-106。
- ⑨ 中共中央統一戰線工作部：〈開創黨外知識份子統戰工作新局面〉，《人民日報》，2021年7月29日，第12版。
- ⑩ 孫明、呂鵬：〈政治吸納與民營企業家階層的改革信心〉，頁93。
- ⑪ 中共中央組織部編：《中國共產黨組織建設一百年》（北京：黨建讀物出版社，2021），頁205。
- ⑫ 席富群：〈建國初期中國共產黨的知識份子政策述論〉，《史學月刊》，1998年第5期，頁53-56；楊鳳城：〈1949-1956年黨的知識份子政策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學報》，1999年第1期，頁71-74；于風政：〈改造：1949-1957年的知識份子〉（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耿化敏：〈執政黨知識份子問題研究的回顧與前瞻〉，《黨史研究與教學》，2005年第4期，頁90-96；孫丹：〈建國初期知識份子思想改造運動研究述評〉，《當代中國史研究》，2008年第3期，頁89-96；李潔非：《典型文案》（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0）；楊奎松：《忍不住的「關懷」：1949年前後的書生與政治》（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3）。

- ⑬ 關於蔣維喬的生平研究，參見何宗旺：〈蔣維喬思想研究〉（湖南師範大學博士論文，2003）；王景玄：〈蔣維喬教育思想與教育實踐研究〉（西南大學碩士論文，2011）；葉舟：〈「過渡時代」知識份子的日常生活：蔣維喬在上海（1903-1911）〉，《史林》，2015年第1期，頁11-22。
- ⑭ 該日記長期藏於上海圖書館，2014年北京中華書局將之影印成冊（全三十冊）。筆者多年關注這部日記，曾做了若干年份的整理。筆者曾整理蔣維喬1913至1915年的日記，連載於2011至2012年的《出版博物館》上。此外，汪家熔先生曾整理1914年之前的蔣維喬日記，先在1992年第3期《出版史料》上發表1902至1912年的日記節選，又於2019年由北京商務印書館出版輯註本《蔣維喬日記1896-1914》。
- ⑮ 林盼、胡欣軒、王衛東整理：《蔣維喬日記》，第一至八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
- ⑯ 關於知識精英如何捲入時代的洪流之中，與社會政治產生怎樣的互動糾葛，可參見李細珠：〈政治轉型期歷史學家的因應與境遇——讀金毓黻、顧頡剛、夏鼐日記〉，《史學月刊》，2016年第4期，頁43-59；常利兵：〈文人士改：建國初期知識份子的革命實踐與話語表達〉，《上海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2期，頁79-96。
- ⑰ 〈中央宣傳部關於新收復城市大學辦學方針的指示〉（1948年7月13日），載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十七冊（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2），頁240。
- ⑱ 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報告〉（1949年3月5日），載《毛澤東選集》，第四卷，頁1427-28。
- ⑲ 〈中央關於京滬杭地區應注意吸收自由資產階級代表參加工作的指示〉（1949年4月7日），載《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十八冊，頁213。
- ⑳ 中共上海市委黨史研究室編：《周恩來在上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頁270。
- ㉑ 劉統：《戰上海》（上海：學林出版社，2018），頁107；周而復：〈陳毅市長與知識份子〉，載中共上海市委黨史研究室、政協上海市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日月新天：上海解放親歷者說》（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頁300-302。
- ㉒ 唐守愚回憶，在接管高等學校的過程中，上海市委「主要強調一個『穩』字」，提出的口號是「穩步前進」，方針是「維持現狀，逐步改造」。參見唐守愚：〈回憶上海高校接管前後的統戰工作〉，載《上海解放三十五周年文史資料紀念專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頁358。
- ㉓㉔ 中共江蘇省委組織部等編：《中國共產黨江蘇省組織史資料：1922.春—1987.10》（南京：南京出版社，1993），頁999；1000。
- ㉕ 劉政：〈各界人民代表會議——建國初期民主建政的主要形式〉，《中國人大》，2002年第9期，頁43-44。
- ㉖ 〈蘇南區各界人民代表會議協商委員會委員、常務委員名單〉，載江蘇省政協辦公廳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江蘇省委員會大事記》（南京：江蘇文史資料編輯部，1994），頁331-32。該資料所列名單有誤，駐會委員會委員（39人）中有「蔣竹莊」，副主席有「蔣維喬」，事實上均為蔣維喬，並非二人。
- ㉗ 中共上海市委黨史研究室編著：《中共上海黨史大典》（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頁229。
- ㉘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關於各省、市各界人民代表會議協商委員會工作的意見〉（1951年7月19日），載全國政協研究室編：《中國人民政協全書》，上冊（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9），頁237。
- ㉙ 對於座談會時長和官員講話內容的不滿，並非只是蔣維喬的個人看法。如原任開明書店編輯的宋雲彬就在日記中記載：「凡開會必有報告，報告必冗長，此亦一時風氣也。名為座談會，實則二三人作報告，已將全會時間佔盡，我等皆坐而未談也。」參見宋雲彬：《紅塵冷眼：一個文化名人筆下的中國三十年》（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2），頁119。

- ⑳ 沈飛德：〈張慰慈與文史館〉，《文匯報》（上海），2014年5月26日，第8版。
- ㉑ 〈蔣維喬關於薛德炯工作問題的函〉（1954年10月），上海市檔案館，G25-1-4-19。
- ㉒ 〈蔣維喬關於葉叔眉、沙善餘、宋國賓加入上海市文史研究館的函〉（1954年4月），上海市檔案館，G25-1-4-36；〈蔣維喬關於吸收范之杰、許昭、薛德炯等入上海市文史研究館問題的函〉（1954年10月），上海市檔案館，G25-1-4-22；〈蔣維喬關於吳夢飛、王幼宸薪資問題的函〉（1956年10月），上海市檔案館，G25-1-4-13。
- ㉓ 馬學新等主編：《上海文化源流辭典》（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2），頁693；上海書畫出版社編：《海派畫家辭典》（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04），頁190等工具書中，都將繆谷瑛的卒年定在1954年。但根據《蔣維喬日記》，繆谷瑛於1953年3月23日拜訪蔣維喬，請其作為文史館員的提名人；5月3日，繆谷瑛即因心臟疾病離世，此時文史館尚未成立。因此，上述各類工具書中標註繆谷瑛的卒年有誤。
- ㉔ 〈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關於任命蔣維喬為上海市報刊圖書館館長、嚴獨鶴為副館長等幹部任命的函〉（1955年5月），上海市檔案館，B23-4-179-5。
- ㉕㉖ 沈昌文：〈我和因是子老前輩的因緣〉，《東方早報》，2010年2月28日，S12版。
- ㉗ 參見林盼：〈近觀戰爭——蔣維喬日記中的抗日戰爭〉，載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現代史研究室、上海社會科學院「中國現代史」創新型學科團隊編：《抗日戰爭史研究新趨向》（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20），頁162-66。
- ㉘ 劉統：《戰上海》，頁331。
- ㉙ 〈政協全國委員會學習座談會暫行辦法〉（1950年4月27日），載《中國人民政協全書》，上冊，頁236。
- ㉚ 夏承燾：《夏承燾集》，第七冊（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頁53、55。
- ㉛ 金毓黻：《靜晤室日記》，第九冊（瀋陽：遼瀋書社，1993），頁6787。
- ㉜ 王英：〈政治理想主義下的功利計算——1949年前後中國知識份子的抉擇與生存〉，《二十一世紀》（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2015年6月號，頁55-69；湯森（James R. Townsend）、沃馬克（Brantly Womack）著，顧速、董方譯：《中國政治》（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頁137。
- ㉝ 〈關於加強電影教育辦法六項呈〉（1950年5月），上海市檔案館，B172-1-29。
- ㉞ 張濟順：《遠去的都市：1950年代的上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頁272-73。
- ㉟ 王瑞芳：〈寓教於樂：20世紀50年代蘇聯電影對中國民眾生活的影響〉，《當代中國史研究》，2020年第3期，頁54-66。
- ㊱ 徐鑄成：《徐鑄成回憶錄》，修訂版（北京：三聯書店，2010），頁184、165。
- ㊲ 〈鴻英圖書館館長蔣維喬請辭職的函及上海市教育局覆函〉（1950年9月），上海市檔案館，B105-1-116-1。
- ㊳ 曹佐燕：〈「勝利負擔」〉，頁168。
- ㊴ 肖存良：〈政治吸納·政治參與·政治穩定〉，頁31-34；景躍進：〈轉型、吸納和滲透〉，頁30-54。
- ㊵ 鄭逸梅：〈陳瀛一的《新語林》〉，載《芸編指痕》（哈爾濱：北方文藝出版社，2016），頁317。
- ㊶ 余洋：〈從精英國家化到國家精英化：我國幹部錄用制度的歷史考察〉，《社會》，2010年第6期，頁41-64。
- ㊷ 許紀霖：《20世紀中國知識份子史論》（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頁408。